

目 錄

譯者序	iii
導論	vi
第 一 章 明治擴張主義的意識形態及政治脈絡	1
第 二 章 人物與先例	21
第 三 章 孫中山	51
第 四 章 1900 年：惠州與廈門	72
第 五 章 同盟會	94
第 六 章 1911 年革命	119
第 七 章 1913 年革命	139
第 八 章 1915 年：武力指導	157
第 九 章 孫中山與日本援助	180
結論	189

導論

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到了 1929 年 6 月 1 日算是大功告成，而蘇聯顧問曾一度備受歡迎，加以重用，現在卻已棄如敝屣。蔣介石在 1928 年率領軍隊北向山東，雖然意外的受到日軍阻撓，同時亦一度被逼下野赴日，但最後仍能東山再起。他與租界的金融及工商勢力已建立起牢固聯盟。在內外力量的支持下，蔣似乎能為中國帶來安定，把民國以來分裂的板塊重新統一起來。

1925 年 4 月以降，孫中山的遺體一直安放在北京城外西山的一個廟宇中。孫早於 1895 年已相信南京的中央位置是統一全國的關鍵要素，故其靈柩亦祈能永久安葬該地。後來軍閥內亂結束，孫中山的遺體便運往南京。在南京城外紫金山宏偉的紀念堂中，他可以凝望新政府的一切，包括統一全國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各項措施。在孫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守護神的新角色下，他過往的不足與自相矛盾早已被遺忘。孫中山由這個尊貴的安息地所產生的影響力，比他以前在這城市中所經營的革命活動還要大。

是年 6 月 1 日，連珠槍響打破黎明的沉寂，向沿着中山路聚集數以千計的人們正式宣佈，對孫作最後致敬的儀式已經開始。長達兩里的行列隊伍步離南京，這個隊伍由士兵、各個工會代表及男女童軍組成，另外亦有許多非正式的弔唁者站在路邊，而沿馬路邊都拉起繩索，由士兵

警衛，不許人們越過。士兵都很清楚自己身負重任，要讓今天的活動順利完成，因此一直高度戒備，手指從沒有離開過步槍的扳擊。群眾注視着行列中各個隊伍安靜經過，他們的耐心終於得到回報，終於一睹靈車上巨大而造工精細的棺木。靈車後面是孫夫人、她的弟弟宋子文、她的妹妹與蔣介石、孫科及其夫人、胡漢民，還有這位逝去領袖的其他戰友。所有人的衣着都十分簡單，一律是樸素的白色。靈車拖着藍白相間的繩索，繩索後是各國的外交團成員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逾 4 小時後，大約是 10 時半，靈車抵達紫金山山腳，亦即孫中山安息之地。負責主祭的人早在南京城外換乘汽車到達，重新排成隊伍，拾級而上。挑夫將棺木移往一個巨大擔架，旁邊是藍白相間的挑擔。挑夫從山腳抬棺而上，動作緩慢而吃力，這時候主祭者在前面引導。上山大約要半小時，樂隊亦沿山而上，奏着特別為這次喪禮而譜的輓歌，打破山上的寂靜。挑夫隊伍由 16 人組成，各個致祭者亦不時出手攙扶，隊伍後是一群平民及非官方弔唁者。

在致祭者中，有一群令人矚目的日本人，當中兩位年紀較長的外貌尤其突出。在紀念堂最後的儀式中，其中一位日本人站在蔣介石的身旁，反映出其受禮遇的身份。¹

參加葬禮的人大都沒有注意到這兩位日本人及他們的同伴的身份，事實上他們能在葬禮上佔一席位正是亞洲主義的證明。在孫中山生前曾投入過、奮鬥過的各理想中，亞洲主義居重要部分。雖然日本一面呼喊亞細亞口號，一面在中國進行殺戮，使得這些口號為人唾棄。可是這些想法對孫中山而言，並不僅止於口號。日本人曾景仰他，並與他結盟，

1 有關此儀式，可參 *North China Herald*, 6 June 1929。此文由犬養毅的隨從清水銀藏所寫。清水在《昭和日日新聞》有專欄。參犬養木堂傳刊行會編，《犬養木堂伝》（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39年），中卷，頁 743-767。

並肩作戰，這一切都與亞洲主義密不可分。在孫的革命奮鬥過程中，他從沒有忽視日本人援助的重要性。他曾寫道：“我們一定要讓中國革命官方歷史詳細記下日本友人的無價貢獻。”² 站在紀念碑前兩位滿頭白髮的日本人，是當中貢獻最大的。

74 歲的頭山滿，在日本人領導及啟發下的亞洲團結運動中，一直堅持不懈推動了逾半世紀。不過他們的精神追隨者卻懷抱着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無法視中國為平等夥伴。而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與他們同處在一個相同環境中，亦不肯接受屈居人下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頭山滿只能在個人層面上交到一些親密的中國朋友。他雖然資助孫中山的事業，卻無法阻止孫於日後接受蘇聯的救濟。在孫中山過世後，其所留下的反帝國主義事業，反而引發與頭山滿追隨者政策的尖銳衝突。蔣介石亦曾接受過頭山滿的幫忙，但卻不滿一年前日本人妨礙其北伐事業。蔣的妻子曾在美國接受教育，受此影響，他似乎缺乏頭山滿所認定，以亞洲道德及目標為長處的東方領袖資格。

同是年屆 74 歲的犬養毅是個備受人民擁戴的國會議員，他一生都在為日本的代議政治奮鬥。跟頭山滿及孫中山一樣，他意識到亞洲團結的重要性，因此一有機會便大張撻伐日本政府的親西方傾向，與及其受日英同盟主導的政策。犬養曾認為孫中山是個志同道合的亞洲主義者，因孫接受及感謝日本援助的同時，通常亦接受日本解釋其侵略行為是不得已，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們的共同敵人——不長進的中國政府，多於日本擴張主義。犬養曾是孫中山的忠實支持者，在孫革命過程不得意的時候，他說服日本政府，不要讓孫中山太難堪，同時亦經常對孫作庇護。

2 胡漢民編，《總理全集》（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第1集，頁6。萱野長知卻責怪孫在其著作中沒有充分提及日人的貢獻。參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笈》（東京：日本帝國地方政學會，1940年），頁59。

在孫中山革命事業得意的時候，犬養亦繼續幫忙，派人進行調查，以助革命之發展。犬養毅在 1932 年曾總結其對孫中山的感情：

很少人能像我這樣一直以來支持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及其革命理想。當孫中山及其同志流亡到日本時……我保護他們。孫中山有段時間甚至與我住在一起。我的家就是一個秘密開會的地方……我分享食物及衣服，以及我微薄的薪水。當我與孫中山同住時，我告訴他中國應走的方向，就是跟隨日本走過的道路。³

在 1911 年，犬養與頭山曾一起到中國，同行還有第三位大鬍子，宮崎寅藏（滔天）。在孫的葬禮，宮崎由兒子及好友萱野長知作代表。孫與宮崎家與萱野為至交。二人的思想接近英國著名哲學家及經濟學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而實踐方法則取自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他們的行為比日本官吏的說話更能為日本的錯誤贖罪。

中國民族主義者與日本擴張主義者的合作固然有點不可思議，但在日本弔唁團那一小撮人中，各個政治光譜所代表的分歧則更令人訝異。頭山滿代表日本武士道精神及舊日本道德的傳承者，他認為自己是德川時期攘夷志士的現代化身，立志要延續及發揚最後一個封建武士西鄉隆盛的使命。宮崎則成長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反抗傳統中，他對西方帝國主義感到恐懼、就西方自由主義的發表及為初期農村社會主義爭辯，在各種思想交錯影響下，使宮崎成為一個農民激進主義及東方傳統主義不穩定的混合體。犬養則代表反對寡頭政治及貪得無厭的西方之中的第三條

3 犬養毅對孫晚年親俄表示難過，參其為河上清專書所寫的序。K.K. Kawakami, *Japan Speaks on the Sino-Japanese Crisi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 p. v, vii.

道路，選擇了代議政治。事實上他是推動議會選舉的第一代老將，但由於明治日本初期自由主義的先天缺陷，犬養的團體在反抗政府的時候，不得不愈來愈倚賴民族主義情緒。同時明治日本在政治教育及經驗不足夠，犬養的政黨漸為工業勢力所控制，結果為工業家所利用，迫使政府擴張，好讓商業利益深入到鄰國的土地上。

上述三股勢力之所以能夠合作，主要是有共同的國外及國內敵人，即西方帝國主義及國內的鎮壓。當敵人愈強，他們的合作便愈緊密；若相反，則彼此間關係愈趨於疏遠。孫中山與這些團體最親密的時期是在明治期間，到 1929 年，雖然個別代表間的友情或許仍然維持，但日本的三個團體已無法再合作下去。

宮崎的早逝象徵其團體的衰落，事實上它是最不穩定，亦是最早出現混亂的一群。早期的農民激進者要作出抉擇，若不是退出政壇，便是要把團體轉化為國會黨派，與其他代表相類似的商業利益的對手，進行彼此間的競爭。宮崎、大井憲太郎與及他們其他進入亞洲大陸冒險的同伴大概都選擇第一條路。犬養一派與頭山民族主義派的合作亦告終結，因為當日本力量上升後，外交問題已非關注重點。犬養及頭山反而為了普選問題，各自站在不同陣營。普選很早便是議題，到 1925 年日本正式立法。在 1932 年犬養在選舉中獲勝，他自認熟悉中國事務，承諾選民會去實行一個堅定中國政策。不久，犬養被一些反對整個國會選舉制度的年輕海軍軍人行刺送命。對這些軍人而言，犬養及頭山均冒犯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威，與明治那些寡頭政治家沒有分別。

換言之，上述團體能夠合作只不過是存在共同敵人，他們追求的目標並不一致，他們對亞細亞的目標亦各有自己看法。他們可以幫助孫中山推行革命，但是當革命一旦成功，他們卻無法聯合一起幫助孫建國。

* * *

本書追溯這些日本人與孫中山合作的經過，其合作的唯一恆久結果則是彼此建立的友誼，這友誼令他們在 1929 年受邀出席南京的葬禮。雖然如此，就中日關係而言，它仍是十分重要的一章。當中國民族主義者與日本民族主義者轉為仇讎時，雙方都後悔昔日的親密交往。除了宮崎寅藏這一群人，大部分日本人都認為中國人忘恩負義，不值得結交。另一方面，當中國人回顧 20 世紀初所發生的一切，則認為日本人一早居心不良，準備侵略中國。

無論你是否接受兩者其中之一的解釋，或者要尋找第三個說法，中國及日本這群朋友所做的一切，都絕對有敘述的價值。故事裏的各個主人翁都是熱心活動家，充滿傳奇性，引人無限想像。近代中國的共和主義及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大家一直關注的歷史事件，這個故事亦可以從旁呈現兩者的發展過程。孫中山與日本人交往過程中，在 20 世紀初是一個惺惺相惜的夥伴關係。不過當中國民族主義及日本國力逐步發展時，雙方便漸行漸遠。最後當孫中山要求日本人助其反袁世凱時，雙方關係變得絕望。上述過程反映出政治上及國際上的角力，對孫中山及其日本友人的命運與特質都產生一定影響力。

中國共和民族主義者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國會主義者進行合作時，由他們的具體互動可以發現幾個重要議題：

首先，亞細亞聯盟在日本領導下反擊西方帝國主義，這種想法並非純粹由日本想像而成。假若重新建構 20 世紀初期思潮的想法與環境時，中國革命家與日本民族主義者有其共通之處。無論是中國人或日本人，他們體會到西方帝國主義才是最大的威脅。要應付這個挑戰，次要敵人

有可用之地。對孫中山及其朋友而言，中國與日本有許多共通點，因此兩者沒有理由不能合作。

合作的主角們有不少共通地方：他們願意接受西方文明。孫中山與其日本自由主義朋友信仰一些不太成熟、甚至內容經常出現矛盾的政治思想。西方的衝擊讓他們拋棄不少自身的傳統價值，取而代之則是一堆雜亂無章、但看起來有用及有吸引力的思想。孫中山與宮崎寅藏信仰亨利·喬治提倡的單一稅制，不過若在亞洲農民身上實行，能否解決問題頗成疑問。大井憲太郎則誤解西方自由主義，過分強調國家團結的可能性。孫中山一直相信創制權及全民投票，認為這些經過幾個世代自治後的產物會讓中國的問題迎刃而解。這群人的友誼超越國界，其實孫、宮崎、大井及其在韓國及菲律賓的朋友，他們在各自的社會中，均是政界或文化界的邊緣人。他們對革命的延誤感到不耐煩，無法接受妨礙亞洲爭取與西方同等地位的思維。他們是積極進取分子，亦是冒險家。本書所敘述各種活動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們取得收入之法。孫中山及其日本友人數十年來替他們的活動募集各種資源，向同情者爭取捐助，可以說是“新亞洲”的全職工作者，亦可以說是為革命的策動及冒險而存在的職業革命家。

僅憑個人努力而成功並不容易，最自然的方式是取得各自社會中有政治及經濟力量人物的認同，也就是說他們的活動必須有利於社會的實力派。孫中山雖然與中國的新崛起商業階層有一定連繫，但經常繳羽而歸，因為其對手在社會中的力量根深蒂固。其日本夥伴更糟糕，更沒有成功機會。宮崎寅藏及大井憲太郎等理想主義者也許是人民大眾的英雄，但別人對他們所承諾的援助，卻永遠口惠而實不至。犬養毅及頭山滿既是民族主義者，也是政治家，其支持度則較為穩固。但是，他們背

後的企業家及軍人支持者各懷鬼胎。民族主義者給與孫中山的承諾雖然慷慨，但往往與這些支持者的目的產生矛盾。到明治末期，宮崎與大井明顯已失去作用，孫中山向日本人請求的援助已轉化為權力交易下的骯髒勾當。

雖然，宮崎與大井這些人所策劃的各種詳細計劃及理論，最後都歸於失敗，此研究卻認為過往對明治日本的評價都過於概略及苛刻。昔日歷史研究由於受到 1941 年主流史學思潮影響，因此用極權統制的模式解讀明治時期。其實明治的歷史環境是充滿挑戰性，生氣蓬勃，超越過去許多人的想像。對明治日本而言，如何建設一個現代國家是一個重要議題，對此的看法並非只有一個，而是百家爭鳴。富國強兵當然是個共通目標，但達成的手段卻是多元，這些手段到最後完成其目的時，與原來的構想可以說是千差萬別。正如幕末武士推翻德川政權時，他們所要建立的新將軍體制，亦與明治政府本身完全不同。無可否認，明治政府是個威權體制，而當時的知識分子扮演關鍵角色，比日後重要得多。不過派系政治尚在形成，仍不十分明顯。急於模仿西方亦使當時氣氛較為開放，能接受差異。日本政府本身承認這點，官方在 1937 年出版的《國體本義》便反映此種看法。⁴ 它開宗明義批評明治時代盲目接受西方的個人主義。在明治初期，如果出現一本像《國體本義》般為哲學、政治、教育及宗教輿論設立規範的書必引起強烈反抗。即使到 1890 年，當明治政府頒發《教育敕語》時，指其規範落伍、其想法中國式、其目的反動的批評不絕於耳。

毫無疑問，日本的多元輿論有助孫中山與日本人發展友誼。明治

4 R. K. Hall, ed., *Kokutai no hongji*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Entity of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175-179.

日本若聲名狼藉，孫中山的名望亦難免受損。如果 1898 年的日本有若 1941 年的日本，孫中山不可能結交到日本友人。對租界裏某些代表人物而言，孫中山所有活動都是出賣自我，向日本侵略及布爾什維克恐怖主義卑躬屈膝。⁵ 另一方面，教條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難以歸類孫中山的屬性，認為他頂多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條沒有影響力的走狗。⁶ 要追尋孫中山對日本人的動機如何感受並不容易。然而若要討論孫氏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領導角色時，必須涉及到他究竟如何了解當時的日本社會。

最後，此研究為重新評價日本的亞洲政策與計劃提供新的可能性。雖然日本的亞洲計劃不止一種，同時東京政策的迂迴曲折路徑亦反映出它內部種種不同聲音及雙重性格，不過本書所用方法會開創一個新的解釋，與以前既有的看法有所不同。大部分的研究認為日本對華政策之變化與轉折，很多時因為要利用中國國內異議力量，以達成其侵華的最後目的。⁷ 日本若要達到它的亞洲計劃必須堅守其政策，同時要擁有超人智慧。可是在孫中山與日本友人交往這些年中，日本從來沒有同時具備上述兩個條件，甚至時常一個也沒有。

本書無意否認大部分日本人對中國嘗試某種程度的控制，包括商業、文化與及政治等所有範疇。從 1895 年到 1915 年間，中國變動不已，究竟哪一個派系會勝利？哪一方會對日本最有利？由日本的文化及政治傳統而言，哪一個組織才是日本最友善的鄰居？因為有各式各樣的考

5 R. d'Auxion de Rufflé, *Chine et Chinois d'Aujourd'hui* (Paris: Berger-Levrault, 1926), pp. 171-208.

6 此觀點可見 R. M. Roy, *Revolution und Konterrevolution in China* (Berlin: Soziologische Verlagsanstalt, 1930), pp. 206-236。不同的馬列主義者較正面的評價，參 Karl A. Wittfogel, *Sun Yat Sen: Aufzeichnungen eines chinesischen Revolutionärs* (Berlin: Agis-Verlag, 1929)。

7 例如王芸生謂：“日本對華政策是製造內部矛盾及破壞中國團結。”參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天津：大公報社，1934年），第6卷，頁1。記者 A. M. Pooley 亦評曰：“對東京而言，令中國動亂及中央政府煩惱是最好不過。”A. M. Pooley, *Japan's Foreign Policies*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20), p. 56。

量，才是東京政府遲疑不決的最根本原因。更不妙的是，日本政府即使決定亦未必能夠執行，因為日本有支持中國不同對立派系的民間團體，不斷對政府施加壓力。由於各政治派系在政壇上此起彼落，派系成員與他們的中國友人能趁時機找到臨時支持及經費。宮崎寅藏與日本政府的客卿式關係正好說明這點，它一方面減輕宮崎兩面性的問題，同時也讓日本政府不必在其對華政策具一貫性。

日本對華政策之多樣性，其根源不完全在各團體向東京政府行使壓力，同樣重要的是日本變動中的國際地位，與及軍事和政治領袖如何看待日本之國際地位。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首次嘗試參與中國事務，行動十分積極，並希望能擔任領導角色。從 1898 年維新運動到 1900 年的義和團之亂，日本一直小心翼翼行動，希望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這塊大餅前，它能具體改變中國。日本其實不確定自己有多少力量，因此害怕會出現瓜分中國的日子。“保存支那”這種口號與美國的“門戶開放”類似，但在日本其情感上具影響力。假若瓜分無可避免，日本絕對不能坐視。無論從國內政治或從日本所理解的國際正義來看，這行動是必然的。因此在 1900 年，日本在華北參加八國聯軍之役；在華南亦開始其積極擴張行動。同年，日本亦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東京也許覺得孫中山是一個有用的傀儡，不過孫亦或許有能力創建一個民族國家，因而避免中國被歐洲瓜分的悲劇，而這民族國家亦自會對日本心存感激。

在日俄戰爭後，東京政府的猶疑不決逐漸演變為保守政策。日本其時已經相當有把握控制亞洲，它亦無須小心翼翼顧及國際政治和中國革命運動的左右而調整自身政策。日本其時可以威嚇日薄西山的大清皇朝。當清廷已明顯在其掌握下時，它更可以肆無忌憚說出日本的想法。日本認為與日本比鄰而居的中國，雖然共和中國會是友善及懂得感恩，

但君主立憲較共和體制更為合適。因此孫中山失去日本的寵愛，他的日本友人以前曾擔任日本政府特務，現在反過來成為新政府特務的監視對象。

然而日本輿論卻不讓日本斷然邁向新方向，更何況革命並非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因此孫雖被驅逐出日本，他仍收到不少金錢接濟及道歉，希望把他安撫下來。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已不再受東京青睞，但仍受到日本政府的關注。對日本而言，有關中國政治的任何可能性，都是值得投資及花時間的。

辛亥革命之後，步履蹣跚的清政府走下歷史舞台，取而代之是可笑的袁世凱“共和國”。對日本而言，它可能輸掉的本錢變得更少。與其滿洲主子相比，袁世凱不會對日本有更多讓步。再次，孫中山可得到庇護，因為他至少是一個方便的武器以對付袁。由於各個政策及希望一個一個的幻滅，同時大眾輿論不斷刺耳地高喊支持孫中山，再加上袁世凱巧妙的手腕躲過日本各種需索，最後的結果便是 1915 年的“二十一條要求”。不過“二十一條要求”不但沒有為日本解決問題，反而使事情複雜化。中國這鄰居比以前變得不值渴求、不可信賴，而日本國內的批評卻比以前更為激烈。

當日本開始要在亞洲大陸挑選一個愜意的鄰居時，這困境始終一直沒法解決。中國的人事經常變動不停，而日本面臨的基本困難是要在三個類別中作出選擇，它們是君主立憲者、保守改革者、共和革命者，可是從頭到尾日本都無法解決這問題。當第二次世界大戰走到最後階段時，東京的領袖達成一個模稜兩可的妥協，即同時在中國支持上述三類政府。在滿洲國，末代皇帝溥儀率領一個君主立憲政府。在北京，一群信仰孔子，年高德劭的改革者在追求中庸及保守主義。在南京，汪精衛

率領的“革命派”國民黨宣稱繼承孫中山的遺志。每一個政權與及其相關人物，都可以追溯到那二十多年的革命時期，這亦是本研究關注的時期。

事實上，若不了解當時的問題及有關人士的態度，是無法明白上述的革命年代。本書既然以人物作為中心，因此必須首先觸及犬養毅、頭山滿、宮崎寅藏及孫中山的個人背景。

第一章

明治擴張主義的意識形態及政治脈絡

在封建制度臨近終結的幕末時代，一群愛國之士奮勇對抗德川幕府，而幫助孫中山的日本冒險家們，則自認為幕末前輩的繼承人。在討論這些冒險家參與中國事務的手法之前，應該簡單概述他們自認繼承了的背後傳統。不同的日本人組群都來自各自的傳統，而無論是意識形態或是政治抗爭，這些傳統皆涉及歷史上日本對亞洲的想法，特別是中國。

孫中山的日本友人與他們的德川前輩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強調個性、意志力，以至組織大規模抗爭行動的能力。在近代日本歷史中，這些共同點成為近代日本史的神聖傳統。他們因日本政府的懦弱和解政策而憤慨。其實早在德川末期，當美國將軍培理（Matthew Perry）率領黑船到來時，愛國之士便詬病幕府猶疑不決。由於德川作家們認為中國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姑息西方列強所致，明治後繼者自然追隨這個理路，並進一步發揮。他們瞧不起近年日本的軟弱、落後及抱殘守缺，認為這一切都源於中國。事實上，中國已衰敗不振，不能自救。不少德川作家認為日本必須從西方保衛中國，而德川時期的借鑒則為明治後輩的有用材料。

明治初年，社會及經濟上的不滿，讓上述說法得到支持。當時，武士階級被邊緣化，只有少數特權階級安享權力。後者對外交事務的謹慎

態度，成為政治異議者的最佳試煉場。軍國主義者在征韓論上與政府決裂，另一些人則藉戰爭問題趁機爭取創立代議政制。因此遠早於頭山滿、犬養毅齊集在孫中山陵墓之前，西鄉隆盛與板垣退助已一起為亞洲戰爭共同努力。

一、明治冒險家的意識形態先驅者

與中國革命家合作的日本人，都對中國事務與問題有極大興趣。有些人希望借用中國以尋找與政府對抗的出路。他們指控當政者忽略日本在中國及亞洲的利益，並企圖以此推翻政府。一些更為理想主義者，希望中國能建立一個友好的政府，實行對全亞洲都或有裨益的改革。

日本冒險家都以德川末期倒幕者為喻，為其所作所為合理化。他們仿效前人，自稱為志士。大部分人會在此之上再加稱為浪人。明治時期的志士認為他們是群無家可歸、忘我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決心奉獻給國家，以達成前人定下的崇高目標。

德川的志士指控將軍幕府侵犯天皇的神聖特權，他們並以此為艱險的倒幕抗爭合理化。此外，他們對德川幕府的指控，還有未事先準備好應付西方列強的來臨，及對外國人卑躬屈膝。明治志士把對德川幕府的指控原封不動的放在新政府頭上，指責新政府成為天皇與其臣民來往的鴻溝；同時其寡頭施政完全是私心自用；更糟糕是他們對冒犯外國人感猶疑，並未爭取修改不平等條約。

同時，明治冒險家卻認為他們的政府優於亞洲其他國家。因為當外國先進的科技暴露出整個國家體制的落後與無能時，日本人有能力推翻德川幕府。德川政府被視作一個自私自利、腐敗、落後、無能，以至道德淪喪的非法政權。無論從哲學、政治技巧或外交政策而言，德川政府

成為一切落後、跟不上時代之典型。一言概之：“如中國般”。

封建主義、蒙昧主義、政治懦弱等日本人加於德川幕府的看法，伸延至相似積弱的其他政府及國家。它們都是處於舊時代、道德錯誤，及政治前景暗淡。正如德川志士曾努力把日本的腐敗、無能及懦弱一掃而空，其明治繼承人覺得不能不在中國與韓國追求同樣目標。縱然 1868 年明治維新所帶來的改革及裨益在國內看似匱乏，在海外卻為珍貴。

這些偏見與信念，都集中反映在以下德川志士的幾個口號中：

1. 攘夷與尊王

頭山滿及其民族主義夥伴們一直強調，他們唯一的信念，結晶於幕末志士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口號。這類口號成熟於德川年代，但在這裏我們無須詳述它們的政治、經濟及思想背景，因為我們主要關注的是這些口號的情感意涵，即德川志士的遺志。德川志士用激烈方式表達其忠義及抗議之情，奮不顧身衝破德川統治及法律框架。這些愛國志士不惜一死來表達其決心，成為明治行動派的模範。

對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者而言，林子平（1754-1793）、蒲生君平（1768-1813）、高山彥九郎（1747-1793）等都提供出眾榜樣，證明看似微不足道的個體，亦可以啟發同時代的人們。上述三人都能衝破德川的封建禁令，周遊日本各地。他們置尊王忠誠高於對藩主及將軍的責任。他們向同鄉暴露出日本一盤散沙、積弱不振的真相。為堅持自己的信念，他們寧願面對懲罰甚至死亡。一些史學家以這些愛國者的身處年代，看作德川勢力衰落的開始。¹

1 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東京：民友社，1936年），第25卷，頁35-47、403-514。重商主義的本多利明（1734-1821）比林去得更遠，但因寂寂無聞而逃過被罰。同上書，頁71-85。

在明治時期，這些愛國主義者的驚人壯舉受到尊敬，沒有一個執政者能無視他們。現實上，這些前人手段卻與抗爭者最為匹配，政府官員只得成為抗爭對象。如是者，明治的寡頭當權者最後成為其祖師所定先例的受害者。

2. 西洋帶來的危機

德川的志士曾提出警告，表示英國與俄國是潛在的侵略威脅，並指責政府對此準備不足。德川的排外者如同他們的明治後人一樣，沒有把批判火力集中在外國人身上。事實上外國人對志士的肆意攻擊一無所知，他們在其炮艦保護下安然度日。反之，政府自訂所有職責，但卻無盡忠職守，令天皇與國家瀕臨崩潰邊緣，成為了批判火力的集中目標。

批判者大部分為學者出身，他們有時從漢文書籍了解英國人在中國的活動，有時則透過出島的荷蘭商館獲得資訊，其中兩位是渡邊華山（1793-1841）與高野長英（1804-1850）。² 渡邊提倡海防論，要求破除鎖國，與外人重新交往，他其後因此被捕，並遭受申斥。為免牽連藩主，他最後自殺身亡。其友高野長英是蘭醫，高野因在 1838 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夢物語》的書而招禍，他在書中記載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準備遣返一些日本漁民。德川將軍卻拒絕馬禮遜的船進入，高野因此十分擔心後果不堪設想。他在書中寫道：“馬禮遜已來到廣州，並定居下來。他手上指揮不少戰船，同時英格蘭亦在這地區控制不少島嶼。如果我們用不合法手段對待馬禮遜，災難必然降臨。”³ 作

2 Sir George Sanson,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New York: Cresset Press, 1950), pp. 261-266.

3 D.C. Green, "Osada's Life of Takano Nagahide (1804-1850)," in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January 1913): 429.

者所述錯漏百出，馬禮遜其實已去世好些年，以他命名的船亦早已被迫回航。雖然如此，該書顯示出外患問題於當時得到關注。高野因提出非常規的解決方法而被幕府追捕。在逃亡過程中，他在與追捕者激烈打鬥中被殺。

志士們在政府及政策的批評爭論中，中國的窘境為他們最常引用的實例。他們警告日本與中國在同一條船上，1842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日本很快便會步其後塵。他們建議與中國結盟，甚至征服整個亞洲以抗西方帝國主義。在尊王及攘夷下，擴張主義成為合理的推論。⁴

3. 西洋科學，東洋道德

德川志士中最為消息靈通及願意挺身而出的人，清楚了解到尊王攘夷是無法解決日本當前的問題，同時軍事冒險在未來可見日子亦無法實行。他們警告，日本要維持獨立，必須學習西方技術。當開國與攘夷問題分裂成兩派時，他們為日本提出一個權宜之計，即以短暫開國作手段，以達攘夷的最終目的。

領導這派的是蘭學者們，他們知道倚靠那些中看不中用的武士抵抗西方武器是徒勞無功的。⁵ 佐久間象山 (1811-1864) 是蘭學代表，其生平反映出志士思想轉變的過程。他先從一個正統的儒者變成一個異端的儒者，後來由於他對海防、戰術、醫藥及科技的關注而轉向蘭學。當日本與美國培理將軍簽定神奈川條約後，佐久間認為日本與西方貿易是有益無害。在對開國猶疑不決的氣氛底下，佐久間終於為狂熱的攘夷派所暗

4 土屋喬雄，〈幕末志士の見たる支那問題〉，《改造》(東京：改造社，1938年)，頁159。會澤伯民(1782-1863)建議中日合守黑龍江以抗俄。佐藤信淵(1768-1850)主張先從滿洲、北中國、南中國侵佔中國，然後再南下取印度及暹羅。

5 著名蘭學家杉田玄白對武士批評尤嚴苛，謂：“十之七像婦人，其志劣於町人。”參《近世日本國民史》，第25卷，頁336及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p. 234。

殺。無論如何，他透過其學生產生巨大影響力。⁶ 對明治民族主義而言，論佐久間學生的影響力，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們那位一生中充滿挫折與失望的業師。⁷

吉田松陰 (1830-1859) 曾企圖乘培理將軍的戰艦偷渡，一舉成名。他在獄中寫了一書，敘述其擴張日本領土的計劃。他在去世前三年獲得假釋，後來他建立一間小型學校，向年輕的武士宣揚其帝國主義理論。

吉田原來是個漢學者，他曾主張把所有外國人驅逐出境。在 1849 年，他認為英國會出兵征韓日，因此呼籲以軍事行動處理此危機。他認為阻止英國的最佳方法，是日本向亞洲大陸擴張。他對天皇國家神聖性的強烈信念，令他把這一切視為合理。他完全信服神聖授予的階級秩序：小的必須向大的稱臣，謹慎侍奉；次等國家必須朝貢於神國。吉田認為日本一面侍奉幕府將軍，另一方面忠心於天皇，兩者可並行不悖，但這種忠義已無法滿足當前軍事及政治統一的需要。他逐步認識到只有讓日本開國，才能吸收西方知識以作日本之用。在完成西化階段後，他主張日本擴張勢力至滿洲、韓國，台灣及菲律賓。這些地區又可以成為日本基地，對抗英國、俄國及美國。吉田激烈反對幕府與培理簽訂神奈川條約及與美國領事哈理斯 (Townsend Harris, 1804-1878) 簽訂的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他認為這些條約都是屈辱的。因吉田涉嫌與計劃暗殺協商條約的官員有關，最後被判死刑。⁸

6 參《近世日本國民史》，第 30 卷，頁 147 及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pp. 253-260。有關佐久間之生平，參《新撰大人名辭典》(東京：平凡社，1937 年)，第 3 卷，頁 85-87。

7 佐久間的學生包括重要明治人物如加藤弘之、勝海舟及建議侵滿、韓、印及美的橋本左內 (1835-1859)。參 Yoshi S. Kuno, *Japanese Expansion on the Asiatic Contin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0), volume 2, pp. 93-94。

8 參玖村敏雄，《吉田松陰の思想と教育》(東京：岩波書店，1942 年)；Heinrich Dumoulin, "Yoshida Shōin (1830-1859), "Ein Beitrag Turn Verstandnis der Geistigen Quellen der Meiji-erneuerung," *Monumenta Nipponica*, 1:2 (1938): 58-85;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pp. 269-274。

吉田對年輕一代的志士有巨大影響力，其學生包括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及品川彌二郎。⁹諷刺的是，當他的學生掌握政權時，反對者又特別尊重吉田，把他奉為聖人。

當然，在德川志士中還有其他人物與題材，不過如頭山滿般的明治志士，關於他們所繼承的極端民族主義及熱血情感，其背後傳統我們已有足夠交代。好幾位以上談及過的人物，皆是最為引起明治志士注意的。明治日人崇拜幕末志士，他們毫不猶豫把這些英雄介紹給其中國友人。1898年當維新派領袖梁啟超逃亡日本，其中一名志士向他解釋吉田松陰生平。梁啟超遂使用吉田作筆名。孫中山亦使用過中山樵的化名，然由於大部分都知道孫中山是誰的時候，他便改用其醫學學生高野長英之名。¹⁰

二、明治日本政治抗爭的社會基礎

上文所談及的德川擴張主義理論家之所以有影響力，是因新形成的明治社會中有一大群懷抱不滿及受苦階層。日本國內的壓力，亦造就孫中山的運氣及革命事業。

明治政權所承受的負擔相當沉重，如果它成立後實行措施能夠滿足不同階層的需求，那可謂成就非凡。然而，領導維新的改變只是由一小撮出身薩摩、長州等西日本武士策劃，他們要實施的改革無疑會遭遇很大的反對力量。與前朝的幕府將軍一樣，新政府無法為浮躁精力及野心提供宣洩口。相反，明治寡頭政府必須克制武士階級中排外狂熱。同時在與時間競賽及與帝國主義列強的比拼中，工業化及近代化實為必要。

9 福本義亮，《吉田松陰の殉国教育》（東京：誠文社，1933年），頁475-479。

10 馮自由，《革命逸史》（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1945年），第3集，頁2。

兩者在德川末期雖已開始進行，但仍須加快才能強大日本。另一方面亦要成立現代海軍及陸軍，這不但可以用來應付國內的地方叛變，亦可以阻嚇外國侵略。俄國在北方的威脅已逐步迫近，中國亦在歐洲列強掌控中。日本了解這些威脅愈來愈嚴重。

要增強國力與統一，封建制度必須淡出歷史，而諸大名則被任命為知事、領俸祿及獲華族新頭銜。面對如此迅速的改變，不少人頓然感覺成為犧牲者或被忽略。

1. 經濟與意識形態的不滿

農民承受的負擔最沉重。新政府的開銷龐大，遠遠超過昔日米稅能應付的範疇，同時新興工業亦需政府補貼。由於封建時代的商人缺乏過渡到現代資本主義的能力，因此日本新式工業多由以前武士經營，但財政來源則來自於政府。再者，不平等條約的低關稅規定亦給予外國商品優勢。為克服不公平競爭，政府必須提供援助。海陸軍的建立及特權階級的俸祿等開支，亦使整個稅制結構緊張。由於日本政府不想受制於外人及負外債，所有開支不得不落在農民身上。¹¹ 新土地法容許私人擁有土地，但新獲土地的農民亦要面對新訂高息貸款、佃農化及無休止的勞動。農家的青年一代，不是被政府徵召入伍，就是被吸引到新興工業城鎮中，轉身為無產工人階級。農民的怒火把他們推向叛亂的邊緣。事實上在明治首十年，農民抗爭及起事的數月遠遠超過德川的高峰期。

除農民外，很多保守知識分子亦反對各式各樣的改革及變化。外來

11 Thomas C. Smith,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the Initial Phase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850-1880*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48). 高農稅獲技術提升（特別是肥田料及改良米種）及農地私有化支持。有關生產力的增加，參 Bruce F. Johns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59 (December 1951): 498-513。明治農民的生活勝於封建時期的農民，但農稅吞食他們的利益。

思想、商品及訪客再度受到關注，它們與本土日本成為完全鮮明的對比。這些知識分子擔心日本國粹喪失的可能，他們用筆來表達排外思想，雖然明知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與死硬派的武士一模一樣，不過武士行動更激烈，他們會動武暗殺外人，讓新政府感尷尬。本願寺派僧人佐田介石(1818-1882)道出眾人信念，反對日本與西方妥協。¹²他努力不懈的要保留封建制度，強調日本與西方在人性、風俗、文化、政府、經濟與思想各方面都不同。佐田認為日本憑人口眾多及高尚德行可把侵略者趕走。

2. 不滿的武士

昔日的武士遭遇挫折及失望，他們比保守的農民及頑固的知識分子帶來更大問題。參與明治維新的武士當中，大部分對西化並無興趣，他們最大的希望是推翻僵化的政治架構以開拓新機會。其實不少武士只思考到成立一個由武力爭權的新幕府，他們渴求機會、工作及冒險。

事與願違，封建制度終結了，武士卻成為改革的最先犧牲者，失掉社會地位。原來接受米祿薪俸的，變成新政府的徵稅對象，而微薄的退休金亦令武士失望。即使在德川的和平盛世，武士的收入本來已逐漸下降。新政權成立後，他們在 1871 年所拿到的退休金只有原來的一半。退休金在 1876 年分發完畢。募兵制的成立，令武士失去原來專屬於他們的傳統工作，二百萬武士家庭中有一半未能維持生活。政府竭盡所能幫助他們，例如幫助其轉職至商界，分配土地，安插他們到新成立的軍隊、公務員及警隊裏工作，但仍有很多武士沒有安排到工作，甚至無法適應

12 加田哲二，《日本國家主義の發展》(東京：慶應書房，1940年)，頁 11-13；*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p. 367.

新的社會秩序。¹³

北方各藩的武士與德川家族沒有帶來太多麻煩。北方諸藩本來便較親幕府，在幕末戰爭中，他們是戰敗者，事實上，他們大部分都失去了戰鬥力，同時他們也較接近新的工業中心。不過南方的武士則產生較大問題，他們是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層，因此原本抱有很大期望。新政府第一個難題便是反幕府聯盟中兩個勢力較小的大名：土佐與肥前。當它們被擺平後，剩下來仍然有薩摩的武士。當不滿的武士們了解到無法與政府軍隊抗衡，南方各藩的領導武士便改變策略，決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西方思想抵抗推動西化的人。

不悅的武士參與所有與政府抗爭的運動，並取得主導權。在西鄉隆盛的領導下，他們開始時誘導政府進行軍事擴張，想乘機在新內閣中取得發言權。當此計策失敗後，他們發動幾次大規模叛亂。其後他們又成立政黨，鼓吹代議政府。外交政策成為他們最常攻擊政府的議題，並極盡冷嘲熱諷，指責政府的外交柔弱，沒有原創性，令日本失去它在中國及亞洲應有的地位。

1929年佇立在孫中山陵墓前的日本人全是昔日武士，犬養已成為提倡議會政治的代言人，頭山滿是最似唐吉訶德、最受歡迎。他一生都在模仿西鄉隆盛，而我們對西鄉的貢獻應有所認識。

三、擴張主義及政治對抗

寡頭政治體制內最早的大規模衝突來自征韓論。1873年岩倉具視率領代表團出訪歐美各國，令若干內閣成員缺席。以西鄉隆盛為主的主戰

13 當時廣島抽樣調查顯示，六千名武士中，四千名陷入赤貧。參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the Initial Phase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850-1880*。

派，不滿韓國拒絕日本要求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認為這是個侮辱的回覆，主張用武力報復。征韓論是好戰者首次嘗試強調其主導地位，在日本近代歷史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首次利用外國問題以主導政府政策，亦成為最著名的一次。在辯論的過程中，可以看到“自由主義者”與軍人的合作，為日後軍部崛起的先兆。因此，我們須要對主戰派內部的構成作簡介。

西鄉隆盛有意出使韓國，幻想若他因此被殺，日本便有出兵藉口。他認為只有透過戰爭才能重振日本傳統軍人價值，在新政府中給與軍人恰當位置，與及挽救無法適應新環境的武士階級殘存者。西鄉的追隨者鳥尾小彌太認為，日本無法同時在軍事及政治上作改革，而軍事不但在改革上比政治來得快，而且亦是日本力量的基礎，因此日本應集中力量恢復武士階級，把它建立成軍隊核心，而政府應把三分之二的財政給予軍隊。¹⁴

由副島種臣率領的外務省認為戰爭有助提升國家聲譽，亦是解決國內問題的出路。有一次副島與英國公使巴夏禮 (Harry Parkes) 談話，他認為派出兩軍總共約兩萬五千人便足夠橫掃朝鮮半島，一百天內便可以征服韓國。他吹噓說韓國可以養活十萬武士、它的礦產及絲綢十分有價值，而韓國政府將由西鄉及他作代表。¹⁵ 副島對韓國的獨立沒有絲毫興趣，他認為朝鮮半島早晚會被佔領，日本不應該落後別國，應首先出手。他甚至相信要維持日本獨立，必須要控制山東、華北以及朝鮮半島。¹⁶

主戰派第三個派別特別有趣，它包括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江藤

14 Ariga Nagao, "Japanese Diplomacy," in Alfred Stead (ed.), *Japan by the Japanese: A Survey by Its Highest Authoritie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4), p. 165.

15 F. C. Jones, *Foreign Diplomacy in Korea, 1866-1894*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35), p. 93.

16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伝》(東京：黑龍會，1933年)，上卷，頁88。

新平等日本日後著名的自由主義領導人。無可否認，他們提倡的自由主義，與今天的有所不同。不過他們反對藩閥政府，為建立人民參與制度所作的努力，這些都是明治政壇上的正能量。他們提出新論說：戰爭還是和平，必須由所有人民決定。有謂西鄉隆盛亦持此說。¹⁷

在辯論的過程中，冒險家與特務的活動不斷，成為日後擴張主義者角色的先聲。在德川時期，佐田白茅（1832-1907）是個排外主義的代表，主張韓國在歷史及地緣對日本甚為重要。他在 1870 年親往朝鮮半島，但未能以日本政府外交代表身份與韓國交涉。回到東京後，他建議出兵韓國，並得到板垣退助等人的認同。不過中途退出岩倉使節團趕回日本的大久保利通卻不支持。¹⁸ 其實有不少人補充佐田的想法，例如江藤新平一度建議派遣佛教僧侶到中國，並派軍隊護送。¹⁹ 1872 年西鄉在與副島及板垣商議後，派出三人到滿洲。三人回來後提出報告，表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這個報告即時引發主戰言論。²⁰ 翌年西鄉再次派遣海陸軍人員充作領事，走訪台灣、廈門、華南等地作觀察。外派人員帶回來不少資料，其中包括一幅台灣地圖，它在 1874 年出兵台灣時派上用場。²¹ 有關征韓意見仍不絕如縷，丸山作樂（1840-1899）曾私下擬定計劃，在韓國煽動革命，並向德國商人借錢及由怡和洋行提供船隻。當丸山的計劃被揭發後，他本人馬上被送進監獄。種種類似計劃及策劃者，既是戰爭熱情的反映，亦是推波助瀾者。²²

雖然主戰派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但在朝中輸給岩倉具視。岩倉強

17 同上，頁 36。

18 同上，頁 18-25。

19 同上，頁 49。江藤主張日本佔領中國以在亞洲推廣進步政制。

20 同上，頁 38。

21 同上，頁 38-39。

22 同上，頁 29-33。丸山後來在政壇頗有影響力，他曾成立新政府政黨及出任伊藤內閣的憲法委員會成員。

調日本當前最大危機，是來自俄國及西方列強。²³ 主戰派最後離開政府，不過寡頭政府的問題仍未解決，不滿仍然持續。反對派則採取更明顯立場，支持一些更具人氣的政治領袖。

為了安撫極端分子，日本政府決定派兵出征台灣，其起因是琉球漁民因船難漂流至台灣，卻被當地原住民殺害。²⁴ 這次軍事行動約有 3,600 名武士參加，由西鄉隆盛弟弟西鄉從道率領。由於行動規模不大，同時事後與中國協商的結果亦不算完滿，因此台灣出兵只解決政府少數問題而已。²⁵

在接下來的日子中，極端民族主義者先後離開，而寡頭政府的外交政策並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與韓國經過好幾次交涉失敗後，終於在 1876 年經中國斡旋，日韓兩國才得以簽訂江華島條約。日本政府急於要取得與西方列強平等的地位，希望藉此維持帝國聲譽，才只得在 1871 年與中國簽訂首個通商條約時，千方百計刪去溫和的互助條款。²⁶ 日本政府對西方政府的態度，溫和而卑屈，冒險家與極端分子難寄厚望。他們遂採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就修訂對外條約及改革內政事宜，加以反對及施加壓力。接續而來的武士反亂則是以征韓作為口號，然隨着反亂失敗，征韓夢破滅，要求代議制度的政治組織才展現氣勢。亞洲擴張自始便是攻擊政府的最常見手段，而日本的代議政制從開始已傾向好戰。²⁷

23 大津淳一郎，〈大日本憲政史〉（東京：寶文館，1927 年），第 1 卷，頁 571-677。

24 同上，頁 853。伊藤博文事後解釋，政府當時的選擇只有出兵台灣或內戰。

25 此役其一之長期效應是大隈重信及三菱創立人岩井彌太郎的結盟。大隈將政府船隻給岩井以換取其服務。

26 T. F. Tsiang,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70-1894,"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7:1 (1933): 5.

27 岡義武，〈明治初期の自由民権論者の目に映じたる當時の國際時勢〉，《政治及び政治史研究》（東京，1935 年），頁 471-514。亦參 Robert A. Scalapino, *Democracy and the Party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3), p. 58。

1. 武士反亂

在主戰派離開內閣後，他們的武士追隨者便非常討厭這個由他們助建的政府。不但他們夢寐以求的光榮與冒險完全落空，自身亦成為政府的監控對象。政府的恩將仇報與懦弱都令他們痛心疾首。同時，封建傳統與個人關係仍然深厚，地方聯盟由此而生。土佐的大部分有才者都加入板垣退助組織的政黨，肥前的武士則跟隨大隈重信。薩摩武士之中，沒參與政府者跟隨西鄉隆盛，另一些薩摩武士則掌控海軍，與操控陸軍的長州藩武士相互輝映。

明治初年有一些讀書會是以軍事為重心而成立，而政治團體在開始時與上述讀書會並無太大分別，兩種組織都成為擴張主義的溫牀。1874年1月，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副島種臣、江藤新平等人把以前一個非正式組織擴大，成立愛國公黨，在其原則宣言中，首三點強調透過大眾參政，以維持及保護天賦民權、愛國及國民團結。他們所使用的民權一詞，成為日後政治鬥爭的重要口號。第四點把關注延伸至亞洲其他地方：“我們追求普世權利，當然亦以此為世界任務，延伸到整個亞洲”。²⁸ 因此，日本自由主義自最初已顯示廣泛的亞洲目標。

三個月後，板垣退助、片岡健吉等人在土佐創設立志社，是所專門培養年輕武士的政治訓練學校。²⁹ 1875年2月板垣成立另一個政治團體愛國社，其大阪會議約有四十餘名武士出席，是當時人數最多的同類集會。其宣言表示社員都熱愛天皇及國家，同時會致力追求個人權利。³⁰

28 《大日本憲政史》，第1卷，頁794。

29 同上，頁836-837。其宣言並未提及亞洲，它主張廢除特權、平等及參加歐美成功之道。立志社對困境的武士提供援助，參 Nobutaka Ike, *The Beginning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Jap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0), p. 61。

30 《大日本憲政史》，第1卷，頁842。

這些早期武士組織是日後各個自由黨派的先驅。對政府來說，他們卻是危險的地方勢力，背後是焦躁的反抗者。

由維新英雄江藤新平所領導的佐賀之亂，亦反映政府將自由民權與武士不滿連在一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江藤一直屬於日本最進步的政治圈。此例就如日後西鄉隆盛的個案般，要起事的即時衝動主要來自農村激進派，他們是早期政治組織的主要骨幹，這群年輕人並相信日本須舉國一致迅速征韓。佐賀武士成立征韓黨，但很快便被政府禁止。其理由認為日本真正的威脅來自俄國野心，並非朝鮮的侮辱。不過征韓黨仍然繼續活動，甚至企圖向外國購買軍火。1874年2月佐賀之亂爆發，起義的口實是和平抑或戰爭應由所有人民決定，因此佐賀之亂帶有日後爭取民權的色彩，但使用的議題則與外國有關，藉此給政府最大壓力。³¹

西鄉隆盛所領導的西南戰爭，是武士抗議新政府的最大、最後動亂。西鄉其後成為近代日本民族主義者的英雄，各個擴張主義團體亦通常把它們的起源追溯至這次叛亂。³²

當板垣退助與其他人士正忙於組織政治團體，西鄉則在鹿兒島設立私人學校。這些學校強調效忠天皇，教授漢文經典及提供軍事訓練，同時組織小組討論政治。學員被教導去厭惡包括限制天皇權力及人民權利等東京政府的專制措施。³³

西鄉原來沒有打算馬上造反，他認為要待外國威脅力更大時時機才成熟，但1877年2月出現謠言，說中央政府已經派人到鹿兒島暗殺西

31 《大日本憲政史》，第2卷，頁36-60。作者認為佐賀之亂的性質跟反動及排外的熊本、秋月及萩之亂不同。

32 一些日本學者認為孫中山敬仰西鄉，山川芳次郎認為孫在衣着及做人均仿效西鄉及常看西鄉的傳記，但此說未獲其他學者支持。參 Yamakawa Yoshiro, "The First President of China," *Independent*, volume 76 (New York: 1912): 76。

33 A. H. Mounsey, *The Satsuma Rebellion*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79), pp. 86-87; 《大日本憲政史》，第1卷，頁844-845。

鄉，促使叛亂爆發。鹿兒島的武士本來便對東京疑心重重，故不需要太多刺激便馬上宣佈出兵東京勤王，要從其邪惡顧問中拯救天皇出來。雙方激戰至 9 月，至首領們切腹自殺，叛軍才徹底瓦解。為了平定這個大規模的動亂，政府在人力及資源都十分緊絀，甚至一度向中國請求援助，要求提供軍火。³⁴

西鄉隆盛死後成為日本民族主義者最偉大的英雄，象徵着愛國主義及忠義。以天皇受到蒙蔽為大義名份，西鄉隆盛把日本歷史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其一生可以說是日本武士與英雄特質的例子，不同民族主義團體都奉他為典型。他個子高大，身材魁梧，精於劍道，生活簡樸不華，更重要的是，他的一言一行都被認為是以尊皇為出發。從今天在東京市中心的銅像可見，尊崇西鄉的並不止於反政府派系。

再者，除寡頭政府的幾個領袖外，幾乎所有政治派系都同意西鄉的看法，即在亞洲發動戰爭以驅逐歐洲帝國主義。在反亂過程中，東京政府一直害怕板垣的土佐武士會參加西鄉陣營。³⁵ 這種恐懼並非無中生有，因為板垣陣營中率領好戰激進派的林有造（1842-1921），與西鄉聯繫甚密。由宮崎八郎（宮崎寅藏的兄長）領導的民權派組織，則真的參與了推翻政府的西南之役。只因為中央政府在熊本鎮台的軍隊堅守成功，沒有投降於叛軍，軍隊、政府及武士中的西鄉同情者才不敢輕舉妄動。在自由民權陣營中，西鄉派的命運日走下坡，而板垣及片岡健吉所率領的和平派最後則得償所願。雖然如此，兩派的差別只在手段上，正如一份政府秘密報告提到，板垣說過：“西鄉用武器打擊政府，而我們則用民權。”³⁶ 西鄉失敗之教訓，如果要繼續追求權力及冒險，唯一的方法就是

34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70-1894," p. 62.

35 *The Satsuma Rebellion*, p. 161.

36 《大日本憲政史》，第 2 卷，頁 112。

利用政治結社及對外挑動戰爭。

2. 政黨湧現

由於武士們好戰的慾望無法獲得滿足，而出現各式各樣的政黨，這是一個頗為奇怪的結果。正如上文所提及，如果要取得民眾支持，必須批評政府的外交政策懦弱，這點無論對哪一個黨都是明顯不過。主戰成為政治成功的前提，與頭山滿在 1929 年共同佇立在孫中山陵墓前的犬養毅便是好例子，足以說明這個政治體系的特點。以下勾畫這個政治體系及其歷史的輪廓。

第一個政黨是自由黨，它在 1881 年由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片岡健吉、林有造等人共同創立。³⁷ 其創黨的黨綱並沒有明白指出日本在亞洲的未來角色，只強調其黨員奮鬥的目標為憲法、自由、民權、社會改革及一個強大和團結的日本。³⁸ 從其強調國家團結可見，不論內政問題與外交問題，在野黨與執政當局的鬥爭只在手段，而非目標。話雖如此，日本自由主義者要爭取權利與改革的訴求，當流傳到亞洲鄰國時仍有一定重要性。在會員構成方面，自由黨成員多半來自武士及農村地主，他們在過去被迫支持本身不太喜歡的工業化。他們的陣營有很多冒險家及流氓，只要亞洲有任何冒險的機會，他們隨時會全力投入。

另一個重要政黨是由大隈重信領導的改進黨。明治維新初期，大隈是肥前藩武士的首領，他在韓國問題上站在主和派一邊。薩摩及長州兩大藩壟斷政局，令他感到厭惡，從而離開政府。改進黨基礎主要來自城市的資本階級，在意識形態上較接受英式功利主義，多於自由黨領袖偏

37 同上，頁 47。板垣在 1875 年一度被邀而重返政府，但因不滿政府對韓政策軟弱及缺乏內政革命而辭官。

38 同上，頁 47。

好的法國式自由主義。³⁹ 改進黨控制兩所私立大學，即由大隈所創的早稻田大學及福澤諭吉所創的慶應義塾，它們訓練的學生不少畢業後進入報刊、政治及工商等界別。由於自由黨的方式過於衝動，太激進及暴力，無法吸引這些年輕人。⁴⁰ 雖然在某種意義下，自由黨與改進黨在農村及城市的角色具互補性質，但由於個人發展興趣及人事問題，雙方一開始已無法合作。

在亞洲事務上，大隈一派沒有自由黨激進派般活躍，也沒有他們那般勇於冒險。雖然如此，大隈其後提出一個經典性主張，稱之為“大隈主義”，支援中國革命派分子。⁴¹

在本研究佔有重要份量的犬養毅（1855-1932），無論在國內問題或亞洲事務上都忠實反映大隈的看法。犬養毅早年對政治的興趣促使他進入新聞界工作，在西南戰爭中他是名出色記者，其後他替福澤諭吉及尾崎行雄（1858-1954）工作，並加入改進黨。⁴² 在日本芸芸政治家中，犬養是最接近孫中山者，他亦與亞洲其他無數的改革派及革命派建立親密關係。

為了回應這些政黨的挑戰，政府在 1882 年建立帝政黨。其主要幹部是一群報界編輯，包括之前曾極力主張出兵韓國的丸山作樂。⁴³

由於政府的監視與鎮壓，各民權政黨無法達成全國性規模，沒有這個規模水平，很難推動有組織及有效率的運動。不少小政黨踏上東洋社會黨的命運。東洋社會黨是 1882 年成立，雖然它的政綱溫和，提倡的只

39 同上，頁 520。改進黨的原本黨章不提亞洲問題，只謂主張日本應有強大有力的外交政策以利工商。

40 同上，頁 522。

41 渡邊幾治郎，《近世日本外交史》（東京：千倉書房，1938年），頁 301-306。

42 福澤與尾崎在憲政期是密友及同盟，他們甚至互用對方名稱，尾崎號亭堂，犬養號木堂。

43 《大日本憲政史》，第 2 卷，頁 540。

不過是德行、平等及幸福，但馬上遭政府禁止活動。⁴⁴ 就算政府採取較溫和政策，由於地區主義及派系主義關係，亦不容易出現全國性政黨。舉例來說，在 1882 年成立的九州改進黨，乃分離主義所衍生的各個奇特聯盟的例子之一。它打着立憲旗號，包括來自九州一些反政府核心地區，如福岡、熊本與長崎等區域不同團體的代表，頭山滿便是其中一員。他是玄洋社的代表，積極主戰，在日本早期帝國主義運動中，頭山是個十分突出的人物。⁴⁵

明治時期的政治戰場就是如此劃分出幾大陣營，正如數百多年前日本戰國大名參加的戰役般，勝利者總是歸於背信棄義、狡詐多端的一方。在政治舞台上，重要成員投奔到對手陣營屢見不鮮，其結果是有如萬花筒般的變化，而權力的得失比堅持理想重要。雖說如此，自由主義及民權的口號與訴求充斥於各種雜誌與報刊，而政府為免這些思想會引發行動，經常要壓制媒體言論。

然而政治領袖的威望很快便一落千丈，主要是因為他們為了暴露同行們的腐敗，酷烈謾罵。由於改進黨比較能吸引學生及資金，自由黨只得越趨倚賴粗暴的地方年輕領袖，後者沉醉於早期政黨運動的成功。⁴⁶ 政黨領導人了解外交是個比較引人注目的議題，而且極易獲得正面回應，因此他們都採取強硬路線。在好幾次修改外交條約時，他們都用懦弱、出賣等字眼攻擊政府，結果令條約原地踏步，無法變動。⁴⁷ 以外交為題是

44 藤井甚太郎、森谷秀亮，《明治時代史》，《綜合日本史大系 12》（東京：內外書籍，1934 年），頁 851-853。

45 《大日本憲政史》，第 2 卷，頁 504-505。

46 《明治時代史》，頁 857-862。

47 板垣退助監修，《自由党史》（東京：五車樓，1910 年），下卷，頁 301-306。1887 年板垣及後藤攻擊井上修約中打算允許外國人無限制在日居留及審訊外國人時用外國人法官。連政府領導層的發言人大隈亦加入聲討。大隈在 1889 年任外相，反對派斥責其計劃，民族主義分子更爆掉其一腿。

個聰明的選擇，這可反映於當時的大眾文學。盛行的政治小說中，暢銷書的美好結局，描寫了亞洲命運皆在日本股掌之中的景況。⁴⁸

由於政黨領導人倚賴外交議題，他們的立場自然接近主戰團體的主張。⁴⁹ 當其領導人能暫時進入政府權力核心，或身處國外的時候，其夥伴們便會趨向暴力及直接行動，與主戰者同一鼻孔出氣，其中以自由黨尤為明顯。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自由主義者”與擴張主義者的結盟，反映兩者的許多共同想法，再者此聯盟亦造就日本人資助孫中山的可能性。例如，兩者均借助相同的歷史人物，為日本擴張合理化；他們亦相信日本必須富強及團結。他們的煩惱亦相同，彼此都不滿意寡頭政府面對西方顛覆無能，猶疑不決。現實的考量及政治的需求，使得意識形態南轅北轍的犬養毅及頭山滿兩人，可以結成政治盟友，並於 1929 年共同現身在孫中山陵墓前。

48 小說《佳人の奇遇》便是例子，內有：“陛下神聖主權賜政治自由於人民。人民立誓效忠帝國統治……韓國使臣入見，琉球稱臣，遠東受惠。日本領導亞洲大聯盟”。參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p. 414。

49 有關早期自由運動的矛盾，參遠山茂樹，〈征韓論、自由民權論、封建論〉，《歴史学研究》，（1950年1月），143號，頁1-12；145號，頁19-34。此外，亦見其〈自由民權運動と大陸問題〉，《世界》，1950年6月，頁27-38。

第二章

人物與先例

上章就政黨創立過程中，追溯自由主義者與主戰派的歷史關係，但所談主要是明治領導層，亦即政治光譜中的上層階級。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犬養毅所代表的是被尊重及有認受性的政治常規。這些社會上的著名人物，都不會隨便冒險，直接介入國內或國外政治事件的行動，事實上，當民主運動在 1880 年代醞釀行動，不論在國內冒險發動政變，或在海外遠征，政黨領導人都會急忙解散其徒眾一段時間，以維持他們的尊貴地位。

因此，韓國或中國的亡命革命志士只好在日本尋求其他類型的人援助。革命志士的要求可以有好幾個方向。如果他們只需要金錢或棲身之所，日本愛國團體的領導人接待他們問題不大。頭山滿及其部下可以用俠義精神或武士道為名，扮演橋樑角色，給孫中山引見日本政界或財經界有影響力人士。

另一方面，若韓國或中國志士尋求意識形態方面的支持，頭山滿的日本主義則不太能夠幫得上忙。這些日本保守主義的領導人行為令人尊敬，但縱使他們願意幫忙，其保守思想卻不適合那些要在中國或韓國建立共和政體的人。相反來說，革命志士只能在日本民主運動激進派裏才能找到同情的聲音。這些激進派是少數心胸較廣，不只會關注日本一貧

如洗的武士或失意的政治家。大井憲太郎或宮崎寅藏這些人，他們會在意經濟正義、受壓迫農民及民權等問題。無可否認，他們亦是愛國主義者，對愛國團體的擴張口號並不介意。他們缺乏自己的資源，只能與其他團體合作，若他們認為是可助其達成在海外的目標，甚至政府的資助亦欣然接受。

這些人正是孫中山所倚賴，取得日本友誼及援助的渠道。既然他們經常從事一些不負責任的冒險行為，有損日本政黨的聲譽，他們亦會參加中國沿海的革命活動。他們活在政治與社會責任的邊緣，其活動並不為人所知。不過他們可以與頭山滿等愛國團體的中堅分子合流，甚至有些時候可以配合政府的計劃。從樂觀的角度而言，他們在國內或海外的行動為昔日武士提供一個理想目標，使這些武士的情緒有出路。這些武士在德川時代時自視甚高，目空一切，但在工業化及西化的迅速深化過程中變得失落、萎靡不振。

那些韓國或中國的避難者在面對日本各個截然不同的團體時，很快便發現彼此至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政治領袖、自由主義者及專業愛國者在亞洲問題上口徑一致，希望亞洲可從西方帝國主義這個恥辱的象徵中解放出來。他們都討厭條約港口、治外法權及無自主關稅。這些共同目的成為結合他們一起的力量。不過到 1900 年，日本本身亦可以從帝國主義中獲得好處，它在中國建立租界，收留不少革命分子，並容許在其租界活動。最初日本的帝國主義威脅不及西方。日本靠自力解救本國，對鄰國而言它是個理所當然的助力，無論對理想主義、機會主義，還是好戰主義來說，都是合適的借題。

日本人所以成為孫中山的援助者及友人，不單是因為彼此同樣討厭西方帝國主義，另一原因是跟孫中山一樣，他們都是專業冒險家及全心

全意的策動人。在日本社會中，他們在思想及財政上都沒有自主性。我們接着會介紹頭山滿的愛國團體，他的思想根源完全是傳統的“日本主義”。他的經濟來源，則主要來自認為其活動有利用價值及合意的礦業老闆。大井憲太郎對韓國改革的興趣，為日本人與孫中山的關係開了一個先例。大井建議的社經改革重點跟孫的想法相近，可是他的立場所得支持並不多，大井憲太郎及其激進自由主義夥伴只好訴之於法律外手段。他們在失敗後經常與頭山滿等民族主義者合作。這些人物榜樣及活動先例無疑影響宮崎寅藏。宮崎是大井所建立傳統的追隨者，並致力幫助孫中山。概括探討民族主義團體與“激進自由主義者”的關係，可以幫助了解兩派為何會合作支持孫中山。

一、頭山滿與其愛國團體

早期的愛國團體主要源於武士們對明治政府的不滿，它們與政黨一樣都是以地方起家。與政黨不同之處是它們完全沒有去除地方特色。它們的主要基地是九州的福岡，福岡是日本所有地方中最接近亞洲大陸的據點，在 1274 年它是蒙古侵略的目標，16 世紀豐臣秀吉遠征韓國亦由福岡出發。在征伐西鄉隆盛的西南戰爭中，它亦是政府軍隊登陸及軍事調配基地。那時福岡武士的怨氣特別明顯，該地的城堡一度為數百名武士圍攻，幾乎被攻陷。¹ 當整個日本在進步時，它相對仍是一潭死水。無論新興工業建設與其帶來的好處，抑或新政府的用人，均與福岡無關。福岡主要產煤。由最初開始，日本的煤礦業以高度剝削臭名遠播。無論是招工方式或工作環境都相當不人道。² 福岡的礦業老闆感激於頭山滿的

1 *The Satsuma Rebellion*, p. 162.

2 Shidzue Ishimoto, *Facing Two Ways: The Story of My Life*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5), pp. 161-163.

投誠。

磯山的背叛導致整個行動陷入混亂，警察很快便掌握整個事件的動向，這其實也不是一件太難的事。1885年11月23日，130名冒險者及其同黨被逮捕，接下來很快便是審判。大井、小林及磯山被判六年徒刑，景山及山本則被判一年半。⁴⁵有趣的是，這個審判與半世紀後的年青軍人受審十分類似。這些軍人也是同樣採取直接行動。法庭容許大井用較長時間陳述其想法及理想，他花了三天時間作了一個慷慨激昂的演講，說明自由黨的行動是啟蒙式、具兄弟愛護之情，與一般的出征不同。⁴⁶

1885年以後，金玉均對日本政府再沒有利用價值，外務大臣井上馨甚至考慮把他交給中國政府。⁴⁷金本人想去美國，但缺乏經費。⁴⁸自由主義者與金玉均仍維持友誼，他們極力要說服政府，每個月給金玉均一筆小津貼，但金十分失望及憤恨。1894年金玉均被中國特務說服前赴上海，他們表示李鴻章也許能給予幫忙，結果金玉均卻在上海被暗殺，引起其日本友人的極端憤怒，也反映出他們對金玉均所抱有的感情。⁴⁹

自由主義者在韓國一敗塗地。⁵⁰他們希望能得到韓國人的感恩，然其所付出的卻只引來猜疑。我們必須謹記，他們在韓國的活動有多方面不利因素。首先是日本人對韓國人的行為。⁵¹其次是韓國人的嫉妒及顛頊。

45 《大日本憲政史》，第2卷，頁732-733。

46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110。頭山本來計劃在韓起事，但當大井這事被揭發後便取消。同上，頁120。諸人在1889年頒佈明治憲法大赦政治犯時獲釋。1890年大井及山本成立一學習中、英、法文的私塾。參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編纂會，《明治編年史》（東京：林泉社，1940年），第7卷，頁363。

47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70-1894," p. 95.

48 《世外井上公伝》，第3卷，頁758。日本政府把他放逐到小笠原群島，然後是北海道的札幌。

49 犬養木堂傳刊行會，《犬養木堂伝》（東京：大京社，1932年），中卷，頁775-781。犬養對金評價甚高。金信禪宗，操流利日語及有學問，他死時仍帶着犬養借給他的《資治通鑑》。

50 他們在中日甲午戰爭時最後嘗試改革韓國，荒尾精為顧問，後藤為大使。不過伊藤派井上赴韓，結果反令韓人產生離心。參《大日本憲政史》，第4卷，頁493-506、588。

51 Jones 在 *Foreign Diplomacy in Korea, 1866-1894* (p. 219) 引 1890 年一英國人的記載：“韓國人涉犯罪會被警察或日本人痛打，拳打腳踢，當他們是畜牲看待。”此行為在當時很普遍，無助亞洲主義的事業。

日本政府亦沒有給他們太多幫忙，最後是自由黨經常訴諸直接行動及暴力，這都削弱他們在國內以至海外的聲望。

在十年後，當孫中山現身歷史舞台時，上述所有因素都不一樣。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喜歡中國人，但卻很少人視中國人為下等民族。中國革命志士的組織能力遠勝韓國的改革者，同時他們擁有其他援助來源。日本政府採取一個較為明確的反清態度。最後是關心中國問題那些團體，大部分屬於國會派中較為穩定的一群，與企業界及教育界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宮崎寅藏雖然有自由黨背景，但其行動經常取決於犬養毅的意向。

三、宮崎寅藏與其在中國的先行者

日本人在中國的活動自始便一直受到限制，遠沒有在韓國的方便。日本政府較為傾向於小心翼翼的政策，而自由主義者則專注於他們在韓國的活動，因此調查及開發的基礎工作，由冒險者在愛國團體支持下處理。

一般而言，外國顧問多半支持政府的妥協政策，而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則反對。⁵² 1890年後日本政府逐漸放棄妥協政策，因為它現在已變得強大。同時在國會召開後，公眾輿論給予更大壓力。在這個時點中，先驅冒險者的早期工作顯得十分有價值。

冒險者冒着一定程度的危險深入中國內陸，因為日本早期與中國的條約不及歐洲各國，日本人比歐洲人擁有較少權利在中國旅遊和居住。⁵³ 唯一的方法是打扮成本地人，穿上當地服裝。因此日本人為了裝成中國

52 《近世日本外交史》，頁 135-142；蔣廷黻認為和平政策只是短暫手段，日本長期目標依然是侵略。參其“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70-1894,” pp. 105-106. 不過日本民族主義者並不明白。

53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70-1894,” pp. 105-106.

人，很早便留着辮子，遠早於孫中山把辮子割去以扮成日本人。

1. 商業調查

荒尾精（1859-1896）開創一個最重要的研究活動，並親自執行。在外語學校接受訓練後，荒尾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由於表現出色，他被調往參謀本部中國課。當時參謀本部正要成立一個專門收集及處理中國情報的部門，荒尾受託此任務。1886年參謀本部派遣荒尾到上海，他在那裏認識岸田吟香。岸田在銀座經營名為“樂善堂”的藥店工作，並於1880年在上海開設支店，荒尾便以其商號作為活動據點。⁵⁴岸田需要年輕及進取的員工及行銷人員，而其商業往來與情報活動剛好配合得天衣無縫，因此他委託荒尾精在漢口開設樂善堂分店。荒尾趁機組織一小規模特務網，遠赴中國最遙遠部分搜集風俗習慣、政治狀況、山川地理、農業、工業及商業各方面資料。樂善堂的特務要靠賣藥及書籍來籌措自身的生活費用，因此他們的生活飄泊不定，十分艱苦。荒尾精令他們相信是為中國的最終改革而努力，這是當時最重要的目標。

荒尾精於1889年改變方向，從事中日間的商業和貿易往來，以應付在東方的西方商業力量。他放棄軍隊的工作，並與重要政治領袖商量後，花了兩年時間周遊日本，促請日本商人趕快投資中國。他創立一個新機構，稱為日清貿易研究所，並率領兩百名學生前往上海。荒尾原來期待日本國會能給予補助，但最後無法實現，只能倚賴商界捐助才能維持下去。根據某些資料，日清貿易研究所的畢業生並沒有按照該所的成立目

54 岸田吟香（1833-1905）在橫濱與赫本（Hepburn）醫生共事。他與濱田彥藏在日本開辦首份西式報章及在征台時作戰地記者。參“The Genyōsha: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p. 279；《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下卷，頁659-660；《新撰大人名辭典》，第2卷，頁271。

的發展，約半數的畢業生進入軍隊工作，另一半則成為無所歸屬的浪人。只有兩名學生進入商界，擔任金融工作。⁵⁵ 用諾曼 (Norman) 描述黑龍會情況的撮要來說：“在他們的課程結束時，日清貿易研究所會把畢業生分成若干組，每組約 20 人，組成旅行團，分別前往中國各地、滿洲、泰國、印度、菲律賓及南海。其後有些會被僱用為大型日本企業的地區代表；其他人則會受僱於日本領事館，成為遠東貿易專門家；到中日甲午戰爭時，很多人出任情報搜集及政府翻譯人員，其他人則再成為日本冒險家，人數愈來愈多，不過其身份地位則難以界定。”⁵⁶ 因此荒尾能夠為軍隊提供翻譯人員及特務，由於這些人都以無名姿態從事工作，其價值更大。荒尾本人曾在韓國工作，其後在台灣去世。荒尾到台灣的主因是發展新組織以研究東南亞貿易情況。⁵⁷

全因有荒尾及類似的人物，日本不久便搜集到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1897 年的一天，遼寧省營口的日本領事館門前出現兩個衣衫襤褸、骯髒不堪的乞兒。當他們被驅趕時，其中一人大聲叫喊：“我們是日本人！”他們馬上受到歡迎，並被隆重接待。營口的故事其實在中國其他日本領事館中都發生過。上述兩人，其中一人是山田良政。他曾在滿洲地區被俄國人逮捕，最後終於逃脫，並旅行到山東。另一人是小越平陸，他曾在海軍服務，為了解俄國狀況，辭去海軍職務。他亦曾巡遊黃河流域，在其出版的《黃河治水》一書中建立一套理論，即只要控制黃河，便可以拯救中國，振興亞洲。他說：“方法就是幫助黃種人在這塊土地上發

55 鷺城學人，〈現時の支那通〉，《中央公論》，28:12 (1913): 11-12。

56 “The Genyōsha: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p. 280.

57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下卷，頁 607-612；《新撰大人名辭典》，第 1 卷，頁 123。

展，這對王道關係至大”。⁵⁸

總括來說，這些人很多掌握非常廣博的中國有關知識，甚至比孫中山有過之而無不及。山田良政在 1900 年參加廣東惠州起義，願意為此犧牲。這些冒險者的活動及遊歷均巨細無遺記載於黑龍會各種資料中。他們十分不滿意日本和平及進步過程，認為是平淡無味，而中國的經驗給予他們一個出路。⁵⁹

2. 文化連帶的價值

除了上述這些商業冒險者外，另外亦有一些團體組織起來，尋求中日文化的共同性。中國第一位駐日公使何如璋在 1877 年抵日後，大久保利通及其他一些人對交換學生產生興趣，因此在 1880 年組成興亞會，何如璋被邀請到首次聚會中發表演說。興亞會設立一所中國語學校，有中國人老師，就讀學生很快便過百，其後與政府的外國語學校合併。1890 年又出現東洋協會，它的組成人員涵蓋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主辦者包括懼俄的近衛篤磨公爵、大隈重信、後藤象二郎、伊藤博文、犬養毅、大井憲太郎、荒尾精及頭山滿。東洋協會的成立宣言呼籲加強對亞洲研究。一方面有助工商業及國力的擴張，另一方面也向會員樹立榜樣，學習西方先行冒險者的精神。

東洋運動最後的成果是東亞同文會的設立，它在 1898 年 11 月創設，當時正值是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擴張的高潮，因此同文會公開的目

58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頁 186-199。兩人獲得領事保護，後來三菱出資送他們返日。有關山田的生平，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下卷，頁 454 及《新撰大人名辭典》，第 6 卷，頁 367。

59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黨成員嘗試用商業鞏固日本在亞洲的地位。他們在 1887 年成立亞細亞貿易商會以促進日本對亞貿易。在宣言肯定商業價值，期望日本成為“東方的美國”。不過此商會並無真正貿易活動，不久便消失於無形。參《自由黨史》，下卷，頁 389-406。

的就是保存中國、協助中國及韓國改革、恢復日本在亞洲正當位置。同樣地，該組織的支持者涵蓋政治、商業、民族主義者及教育界。透過它在中國各地支部，同文會其實亦扮演一個有價值的情報角色。它派出無數的考察隊，橫跨整個中國；亦出版大量報告，公開考察的結果。同文會的角色是為日本提供有關中國的高質情報。⁶⁰

不少對中國真正有興趣的人士不會計較上述團體可以提供甚麼好處，而是全心全意投身進去。這種情況十分普遍，井上雅二是個典型例子，他出身兵庫縣，從小崇拜豐臣秀吉，因此有征服中國的決心。他曾經入讀海軍學校，但在甲午戰爭後退學。荒尾精勸他先研究中國及亞洲，西方可以稍晚。荒尾教他中文、漢典及經濟，並替他在台灣的參謀本部找到一份工作。1896年，井上回到日本，在早稻田（當時稱為東京專門學校）學習三年。每逢暑假，他常和內田良平之類的朋友外出旅行冒險，走遍西伯利亞、中國與韓國。1898年井上加入同文會，從而認識犬養毅、宮崎寅藏與其他中國通，還有當時正逃亡日本的中國改革者梁啟超與康有為。井上雅二其後到上海擔任同文會支部秘書，並出版報紙，旨在反制俄羅斯的影響力及宣傳。在義和團事件期間，他遊歷長江，向日本定期撰寫報告。1901年他到歐洲學習，在柏林及維也納停留一段時間後，沿多瑙河至烏茲別克的塔什干，再到德黑蘭、黑海，莫斯科，再乘搭西伯利亞鐵路返回日本。這次旅行的目的主要是更深入了解俄羅斯。井上其後數年去了韓國，在朝鮮國王宮廷內擔任顧問。1912年後，其關注轉向東南亞，在馬來亞買下一片橡膠園，成為企業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搖身一變，成為富裕的東京工業家，著書二十多本，內容包

60 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對支回顧錄》（東京：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1936年），上卷，頁674-681。有關東亞同文會的文化交流活動，參見藤惠秀，《明治日支文化交涉》（東京：光風館，1943年）。它包含早期清朝駐日大使與日本人交往的日記及文字。

括個人經驗、中國問題、殖民地歷史與政策等。⁶¹

這些促進商業及文化交流的先驅者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暫時處於衰敗狀態，不過它的腐化情況沒有韓國嚴重，若有日本幫忙，中國仍然可以從西方手中拯救。他們的道理與自由黨早期的日本指導理論十分類似，但其背景則出自大隈重信，大隈的改進黨可以說是企業界利益代言人。日本人稱之為“大隈主義”，約在 1898 年提出。當時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正處於最高潮，“大隈主義”基本上是一種貴族式義務。因為日本是第一個成功西化而取得好處的亞洲國家，因此它有責任維持中國自由，免受西方侵略；同時幫助中國改造其政治制度及去除其社會惰性。大隈宣稱中國不會長期積弱不振，一旦有偉人崛起，愛國主義便會隨之上揚，中國便能恢復其在列強間的地位。日本在過去一直接受中國文化及精神，應抱感恩之心，現今決定回報，助中國將西方拒之門外。中國偉人要重建一個友好、懂得感恩的國家，日本會伸出援手。⁶² 在中國尋找偉人，並伸出援手助他完成使命，就是宮崎寅藏一生的使命。

3. 宮崎寅藏

宮崎寅藏的自傳提供一個明確例子，顯示當時學術思潮、政治鬥爭及理想如何將一些日本人與孫中山革命拉在一起。宮崎並非個別例子，其背景正好代表當時整個潮流的趨勢及影響，因此他可以說是各種理論衝擊下的影子及理想的化身。宮崎是孫中山在日本最親密的朋友及夥伴。他的兒子宮崎龍介在 1929 年與頭山滿、犬養毅比肩禮拜孫中山的陵

61 井上雅二的《支那論》（東京：東亞同文會，1930 年）乃其早稻田大學畢業論文，內附 36 頁自傳式序。井上另一重要著作是《巨人荒尾清》（東京：左久良書房，1910 年）。

62 《近世日本外交史》，頁 301-306；大隈侯八十五年史編纂會編，《大隈侯八十五年史》（東京：大隈侯八十五年史編纂會，1926 年），第 2 卷，頁 672。

墓。宮崎的個人自傳《三十三年の夢》寫於 1902 年，目的是說明他的任務為何以失敗告終。⁶³

宮崎在 1870 年出生於九州熊本縣，累世都是武士，同時家中擁有相當多土地，因此在明治維新的過渡期生活依舊無憂。在長大後，宮崎曾回憶在家時常沿着海岸漫步，遙望中國，夢想那些偉大事跡。其母在家中常向他講述歷史偉人故事。其長兄宮崎八郎更是一個活生生的榜樣。八郎參加西鄉隆盛領導的西南戰爭，在帶領一群沒有土地的武士反抗政府時陣亡。⁶⁴ 九州的農村生活相當艱苦，宮崎家育有八男三女，但能夠存活長大的只有四個。

少年宮崎在維新政府辦的公立學校讀書。由於有關他哥哥的英雄故事，再加上動盪蔓延至農村，他對自由主義深感興趣。自傳中告訴我們，宮崎十分景仰自由民權運動中的鬥士，並奉他們所提倡的理想為神聖不可侵犯。在學校裏，他發覺其他同學滿腦子是從政當官的思想，只學會奉承上司。由於宮崎的反政府感情及理想主義，其他同學都視之為另類。

宮崎十歲時父親離世，他的兄長決定送他到德富豬一郎創辦的寄宿學校。⁶⁵ 德富經營“自由派”學校。在 1880 年代日本的所謂“自由主義”與 1945 年以後的“民主”一樣，對不同人代表不同的東西。當時私立學校在南日本如雨後春筍，而德富的學校在當中算是佼佼者。他在學校裏採取民主方式管理，學生可以自由選修課程。他甚至給與學生機會，在校內發表演講。為了表達其自由主義作風，學生不用以“先生”稱呼德富，可直接叫德富的名字。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但頓 (Danton)、克倫威爾 (Cromwell) 及其他革命英雄的故事成為學生日常功課。宮崎深

63 《三十三年の夢》在 1902 年出版，同年在報章連載。它分別出於 1926 年及 1943 年被重刊。

64 《大日本憲政史》，第 2 卷，頁 83。

65 德富是報章編輯及狂熱民族主義者。他為吉田松陰及山縣有朋立傳及作《近世日本国民史》。